

郭沫若 著

历史人物

(含《甲申三百年祭》)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人物/郭沫若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5

(国学基础文库)

本书含《甲申三百年祭》

ISBN 7-300-06262-8

I. 历…

II. 郭…

III. ①历史人物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古代②史评—中国—明代

IV. ①K820.2②K248.3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6480 号



国学基础文库

历史人物

(含《甲申三百年祭》)

郭沫若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lt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印刷厂

开 本 965 × 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 插页 2

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字 数 201 000

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 ~ 7000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关于本书

本书属于郭沫若先生的史学研究著作。在书中，作者对屈原、曹植、万宝常、王安石、李自成、李岩、夏完淳、鲁迅、王国维、郁达夫、闻一多等处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和评价。郭沫若先生广征博引，在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，提出了科学而又独到的见解，突出反映了其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：“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，也从事创作。”阅读过本书后，你将在思考历史、评价历史人物时开启一条思路。

关于作者

郭沫若（1892—1978），著名作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翻译家、社会活动家。原名郭开贞，四川乐山人。1914年初抵日本留学，原学医，后从事文艺活动。1921年与郁达夫、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，出版第一部诗集《女神》。1928年起旅居日本，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研究。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，其间创作了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等著名历史剧及大量诗文。建国后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，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、中国文联主席等职。有《郭沫若全集》38卷行世。

国学基础文库（第二辑）

出版统筹 呼延华

史学方法导论（傅斯年史学文辑）	傅斯年 著
文化学概观	陈序经 著
逻辑	金岳霖 著
论道	金岳霖 著
奴隶制时代	郭沫若 著

青铜时代	郭沫若 著
中国哲学小史	冯友兰 著
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	刘师培 著
（含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《经学教科书》《两汉学术发微论》）	
中国绘画史	陈师曾 著

明明書房 网站: www.longlongbook.com
long-long Book House 发行热线: 010-82503022

策 划 / 郝明慧 责任编辑 / 陈 芃
封面设计 / 袁 璐 版式设计 / 王 哲

《历史人物》版本说明

《历史人物》最初由上海海燕书店印行于1947年8月。1951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印。次年3月，作者对篇目略作调整，删去1921年所写的《王阳明》，收录1942年写作的《屈原研究》，并在《改版说明》中针对这一调整说：“这样，在自己的研究程序和思想发展上比较能成一个段落。”

1959年6月，《历史人物》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沫若文集》第12卷，原书作为附录处理的《关于李岩》一文，经作者校阅后，另编成一篇；同时，《屈原研究》所附录的《离骚今译》以及《夏完淳》被移入他卷。1982年9月，人民出版社出版《郭沫若全集·历史编》第4卷，《鲁迅与王国维》、《论郁达夫》、《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》三篇文章，被从原书中抽出，编入《郭沫若全集·文学编》第17卷。

《历史人物》自初版至今，屡屡重印，篇目几经更动。此次新版基本采用作者1952年3月修订的目录，而每篇文章的内容则分别依据《郭沫若全集·历史编》第4卷和《郭沫若全集·文学编》第7卷、第17卷。此次新版还增补了郭沫若先生1947年10月写就的《再谈郁达夫》，作为《论郁达夫》一文的附录。

原版中的外国地名、人名等专有名词，译法与现在通用译法有别，为存原貌，不作改动；“的、地、得”等副词的用法，异体字、通假字等，也保留原貌，仅对与现代汉语规范用法不同的个别字词进行了修改（如“内涵”改为“内涵”、“引伸”改为“引申”等），特此说明。

2004年10月

改版说明

本书初版编成于一九四七年七月，当时把一九二一年所写的《王阳明》一篇也收录了，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。现在我把这篇删除了，同时把《屈原研究》一书改版，收入。这样，在自己的研究程序和思想发展上，比较能成一个段落。

由于有这样的改动，因此我把原序中提到王阳明的一节也删去了。

郭沫若

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于北京

序

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，但关于历史的研究，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，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。中国的历史实在太长，史料也实在太浩瀚，以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，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。

不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，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。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，更简单地说，主要是凭自己的好。因为出于恶，而加以研究的人物，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。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一句话归宗：人民本位！

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，也从事创作。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。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，或者写成剧本，或者写成小说。在几篇短篇小说中，我处理过孔丘、孟轲、老聃、庄周、秦始皇、楚霸王、贾谊、司马迁。在几部历史剧中，我处理过聂政与聂嫈、屈原、信陵君与如姬、高渐离等等。但有的创作流产了，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。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，如象《万宝常》、《甲申三百年祭》都是。我还有一篇《钓鱼城访古》，也是想把钓鱼城的故事写成史剧的调查工作。史剧没有写成，那篇调查记，论性质尽可以收在这儿，但已经被收进《今昔蒲剑》里面去了。

我对于王安石是怀抱有一种崇敬的念头的，实际上他是一位大政治家，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。他有政见，有魄力，而最难得的是他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。他在历史上出现得太早了，孤立无辅，形成了一个屈原以来的历史上的大悲

剧。这悲剧不限于他晚年的失意,而是在他的新政废止之后,宋室卒于遭到异民族的颠覆,中国的农民老是不得翻身,又苦了一千年。

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轼三个人拿来写成一部《三人行》,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,司马光代表地主阶层,苏轼作为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。这些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观见解,他们三个人在当时实在是代表着这样的三方面。以司马光为代表,漫衍而为南北两宋及其后的道学家,他们在表面上虽然打着儒家的招牌,吃的是孔、孟的残饭,实际上他们是把儒家形式上最坏的一些成分,和道家的精神结合了。那些顶戴着司马光的所谓大儒,周、程、朱、张辈,认真说只是一些道士。在秦、汉以后要找一位纯正的儒家代表,恐怕就只有一位王安石吧。

王安石被埋没了一千年,近代人渐渐知道他的价值了。然而他在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,就在我们新兴历史家的头脑里似乎都还抵不过司马君实和周、程、朱、张。一种传统观念一被形成,要打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《三人行》没有写成,王安石的研究,在本书所收的实在只是一点轮廓。关于他,我在重庆时曾经作过几次讲演,自己觉得讲得也还不错,然而纪录得实在太简单了。那差不多只是王安石的糟粕的糟粕。不过要了解王安石的精神也不在乎要有更详细的文字,只消举出他的两句话已就足以认识他的真面目。

一,“某自诸子百家之书,至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、诸小说无所不读,农夫女工无所不问。”顶重要的就是这“农夫女工无所不问”,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向老百姓学习”吗?

二,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用意是“榷制兼并,均济贫乏”。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倒土豪劣绅,使耕者有其田吗?

《甲申三百年祭》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。主要的

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,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,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,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。

关于李岩,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实在还叙述得不够。可惜关于他的资料是毁灭了,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,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,须知他是主张“均田”的。唯其这样,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,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,并不是单纯的“官激民变”。

认识了李岩的这层重要性,我们请把他和约略同时的一些学者或思想家来比较一下吧。例如顾炎武在前是被视为承先启后的一大鸿儒,特别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,他不受清廷的羁縻,而且还有组织地下运动的传说。但他对于李自成是反对的,可以证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无人民思想。

又例如王船山,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来是够被强调着,骎骎乎驾诸顾炎武之上了。他的民族思想也异常强烈,曾参加南明的抗清斗争,明亡隐于苗洞,坚苦著书,书也到了两百年后才为曾国藩所刊行。这些往事的确足以增加人对于他的尊敬。然而在我看来,他也只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。

这儿有这么一段事实。张献忠到了湖南,慕王船山的大名,特别礼聘他,请他参加他的队伍。王船山躲起来了,不肯和“草寇”合流。张献忠便用绑票的方式把王船山的父亲捉了来,要挟他。弄得王船山没法,只好毁伤自己,被肩舆抬着去见张献忠。张献忠看他那样固执,便把他父子一同释放了。据这个故事看来,我们可以了解张献忠也并不如一般传说所讲的那么胡涂,而王船山的固执倒是可以惊人的。请把这种态度和李岩比较一下怎样呢?李岩不是可以更令人向往的吗?

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,但没有成功。已经有好些朋友把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写成剧本了,可以省得我费事。不过我还有一

种希望,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,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。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,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、实践者。虽然关于他的资料已经遭了湮灭,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

目 录

改版说明	(1)
序	(1)
屈原研究	(1)
附录 离骚今译	(82)
论曹植	(103)
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	(125)
王安石	(153)
甲申三百年祭	(161)
关于李岩	(185)
夏完淳	(187)
鲁迅与王国维	(223)
论郁达夫	(233)
附录 再谈郁达夫	(242)
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	(251)

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

—

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。他是生在战国后半期的楚国的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上有一篇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前半部便是传的屈原。我现在把那大要摘录在下边：

屈原者名平，楚之同姓也，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，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。屈平不与，因谗之。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曰，以为非我莫能为也。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……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若《离骚》者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，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迥而见义远。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

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
屈平既绌，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惠王患之。乃令张仪佯去秦，厚币委质事楚，曰“秦甚憎齐，齐与楚从亲。楚诚能绝齐，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”。楚怀王贪，而信张仪，遂绝齐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：“仪与王约六里，不闻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、淅，斩首八万，虏楚将屈匄，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蓝田。魏闻之，袭楚，至邓。楚兵惧，自秦归，而齐竟怒，不救楚，楚大困。

明年，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，乃曰：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，臣请往如楚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怀王竟听郑袖，复释去张仪。是时屈平既疏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，谏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张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张仪不及。

其后，诸侯共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唐昧。时秦昭王与楚婚，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。屈平曰：“秦虎狼之国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，曰“奈何绝秦欢？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，秦伏兵绝其后，因留怀王，以求割地。怀王怒，不听。亡走赵，赵不纳。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。长子顷襄王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

楚人既咎子兰，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。……令尹子兰闻之，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。顷襄王怒而迁之。

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……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……于是怀石，遂自投汨罗以死。

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，而以赋见称；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

这便是《屈原传》的大略。在传的最后司马迁还有几句评论是：

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沈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

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，因为他把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诸篇，和《离骚》并列，都认为是屈原的作品。

自从有了司马迁这篇评传之后，两千年来讨论屈原的人大都奉以为圭臬。没有人怀疑过。但在近几年来却是大大的发生了问题，竟连屈原的存在都有人要加以否认了。这个问题虽然是新发生出来的，但既有问题发生，如在未能解决之前，又来肯定着对于屈原要作进一步的研究，那等于是于在砂上筑台，全部的努力会有成为空费的危险，所以在这儿要多费一点笔墨来讨论这个问题，看看怀疑的人所持的理由究竟是否充分，而屈原这个人究竟是否存在。

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，第一个是四川的廖平，据谢无量的《楚辞新论》上说：

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，见着廖季平先生。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《楚辞新解》给我看，说“屈原并没有这人”。他第一件说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是不对的，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。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，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，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《离骚》的时代。……他第二件拿经学的眼光说《楚辞》是《诗经》的旁支。……他以为《诗经》本是天学，所讲的都是天上的事，自然《楚辞》也是一样。所以有那些远游出世的思想，和关于天神魂鬼的文词。……他第三件说《离骚》首句“帝高阳之苗裔”是秦始皇的自序。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，《史记》“始皇不乐，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，及行游天下，传令乐人歌弦之”。（秦皇三十六年）……

廖先生的《楚辞新解》我还没有看见过，他的详细的论证我自然无从知道，但在这个简单的转述中他的主张的要点是揭示出了。

其次，是胡适的《读楚辞》，对于《屈原传》也表示过同样的态度。他说：

屈原是谁？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。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，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。为什么我要疑心呢？因为：第一《史记》本来不很可靠，而《屈原贾生传》尤其不可靠。（子）传末（案在《贾生传》末）有云：“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，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，而贾嘉最好学，世其家，与余通书，至孝昭时列为九卿”，司马迁何能知孝昭的谥法？一可疑。孝文之后为景帝，如何可说“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”？二可疑。（丑）《屈原传》叙事不明。先说“王怒而疏屈平”。次说“屈平既疏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，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？王悔，追张仪不及”。又说“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秦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无行”。又说“顷襄王立，以子兰为令尹。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，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”。又说“令尹子兰闻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。王怒而迁之。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”。……既疏了，既不在位了，又“使于齐”，又谏重大的事，一大可疑。前面并不曾说“放流”，出使于齐的人，又能谏大事的人，自然不曾被“放流”。而下面忽说“虽放流”，忽说“迁之”，二大可疑。“秦虎狼之国不可信”二句，依《楚世家》是昭雎谏的话。“何不杀张仪”一段《张仪传》无此语，亦无“怀王悔，追张仪不及”等事，三大可疑。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，此传说是“秦割汉中地”，《张仪传》说是“秦欲得黔中地”，《楚世家》说是“秦分汉中之半”，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呢？四大可疑。前半称屈平，后半称屈原，五大可疑。

胡适的文章,我因为手头无书也还没有窥到他的全豹。这一段也是由《楚辞新论》所转录下来的。他所揭出的疑问,骤看,的确是很值得令人怀疑。我想廖先生以为《屈原传》不可靠,大约也就是根据的这些疑窦吧。

这样的怀疑是应该首先解决的,我们应该来当一个公正的审判官,要看是司马迁可靠,还是廖、胡两位可靠。

廖、胡两位,特别是胡适,对于《屈原传》所提出的疑问,骤看都觉得很犀利,但仔细检查起来,却一项也不能成立。(子)项所列的那一段话,早就有人说过是“后人所增”^①,而那增窜过的文字也还有传说。“孝文崩”,应该是“孝景崩”的错误。(丑)项的五大可疑也疑得不周到。第一层的既疏了,既不在位了,而又使于齐,又谏重大的事,我们如想到现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发抒伟论的近事,便可以不用费笔墨地得到了解。第二层的“放流”两个字当成流谪解,是后来的人讲错了的。其实“放流”就等于“放浪”,并不是说屈原在楚怀王时便遭过流刑。第三层的“秦虎狼之国不可信”的那两句话,本来是很平常的话,昭睢可以说,屈原也可以说,就如现在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的一样,那是毫不足怪的。但关于这一层更有人说昭睢就是屈原的。《楚辞新论》上引刘申叔的话说:

昭姓源流不可考,后世亦无昭姓。惟屈、景二姓是楚同姓。《史记》所说屈原谏怀王及使齐的话,《战国策》都作昭睢,无屈原名字。恐怕昭睢就是屈原。古音本通。

这个见解的根据是非常薄弱的。《庄子·庚桑楚篇》上说:“三者虽异,公族也。昭、景也,著戴也。甲氏也,著封也。”所说的就是楚国

^① 殷本《史记》卷八十四考证引凌稚隆说。——作者注

的“三闾”屈、景、昭。甲氏就是屈氏，说它是音变固可以^①，说它是字误也未尝不可以。据此可见昭、屈原本是二氏。昭是楚昭王的支庶^②，所以说是“著戴”，戴是代的假借。屈是楚武王的儿子屈瑕所封的采邑^③，所以说是“著封”。三者是完全不同的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有善鼓琴的昭氏，其名为文^④，还有他的儿子也是承继着父业的，可见昭氏并不是没有流传。总之，昭睢不能说就是屈原。他与屈原同时而且大约是同志，所以他们说话相同。使齐时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随员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

至于第三大疑问中言《屈原传》中所有的事为《张仪传》所无，这是司马迁惯用的详略互见的笔法，毫不足怪。第四大疑问的黔中和汉中，是胡适太着急，把原书看脱了一半。《张仪传》上是说“秦要楚，欲得黔中地，欲以武关外易之”。黔中是楚地，到了顷襄王二十二年才为秦所取。“武关外”便是指的汉中，三篇文章并没有冲突。只是《张仪传》多提出了“秦欲得黔中地”的事实，后来楚也没有给它，不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并没有到楚国手里。第五大疑问的前称屈平后称屈原，更不能成为疑问，因为“屈原者名平”，司马迁在开首一句就交代清楚了，称平称原本是两可。前半有“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”也明明称的是原。而且“高平曰原”见《尔雅》，“上平曰原”见《公羊》昭元年传，名平字原也是很合乎古训的，不能够说司马迁是误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。

据上所述可见胡适对于《屈原传》所发出的疑问均不能成立，更推到廖平所怀的疑问大约也不过如此。若要更进一步，疑及屈原这个人的存在，那就未免飞跃了。本来屈原和现在已经相隔了二千多年，所有实质上的物证都是消灭了的，假定他的尸首被捞出

① 马叙伦说“甲借为屈，音同见纽”。（《庄子义证》第二十三卷十三页。）——作者注

② 楚昭王名珍与鲁昭公同时，在春秋末年。——作者注

③ 楚武王与鲁隐公同时，在春秋初年。——作者注

④ 《列子·汤问篇》有师文学鼓琴事，俞曲园谓即昭文。《吕氏春秋·君守篇》有郑太师文鼓瑟事，马叙伦也疑是昭文。（具见《庄子义证》第二卷十二页。）当是楚国的人做了郑国的官。——作者注